

罗郁聪 著

现代社会主义 论——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

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库

厦门大学出版社

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库

现代社会主义 论

——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

罗郁聪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社会主义论/罗郁聪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3
ISBN 7-5615-2496-X

I. 现… II. 罗… III. 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理论-研究
IV. F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42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沙县长安路金沙园区 邮编:365500)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875 插页:2

字数:348 千字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在编辑又一本《现代社会主义论》书稿准备出版的时候,我读了前一本同名书的前言、引论和后记,心情不免有一些激动。

为什么说“有一些激动?”可能是因为人老了,历世深了;当时76岁,现今是83岁,8年不算少,不过,头脑还清醒、思想较成熟。特别是原来“我一直怀有一种不完全是多余的担心,抱着坦诚祈求,希望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能获得健康发展的心情”,“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等等,尚能如意实现。虽然“世界变化太大了,中国变化太大了!”而我还能继续“遵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所以,余热又促自奋蹄。

在第一本书研究所得的基础上,把进一步地研究之所得作为学术积累,编成第二本书,书名同是《现代社会主义论》,而其副标题已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国特色”拓展为“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探索”。两种类型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同《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后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同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为俄国所设想的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又可以再划分阶段。当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详细地阐发这类具体的设想,以免流入空想。

19 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阐发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同时,称呼科学社会主义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或现代社会主义。20 世纪 20 年代,列宁斯大林经过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或现代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现代社会主义已不专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一本书中,我着重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中国特色,在第二本书中,我着重探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同时,进一步讨论中国和平崛起和俄国“觉醒”的前途。我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之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决定于两种类型现代社会形态的“趋同”发展。

我能继续出版这本专著形式的文集,应当感激组织和同志们的支持和鼓励,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更觉得亲切,特此致谢。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这本书行将付梓之际,适逢母校厦门大学建立 85 周年大庆和恩师王亚南诞辰 105 周年纪念,特致祝词:“饮水思源”,以表感念之忱。

目录

XIANDAI SHEHUI ZHUYI LUN

前言

引论..... 1

弘扬王亚南的科学精神

敢为人先 勇攀高峰 锐意创新 与时俱进

——弘扬王亚南翻译并运用《资本论》创建

中国经济学的科学精神 11

王亚南对新中国经济的理论探索及启示 20

继承、弘扬王亚南的科学精神

——学习亚南师格言：“要有‘定见’，不能

有‘成见’”的一点感受..... 28

王亚南创建中国经济学对当今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启示 32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与中国经济学 58

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王亚南遗作《恩格斯在创作、捍卫和阐扬

《资本论》方面的伟大贡献》的启示..... 70

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探索

恩格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对两种不同类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03

现代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124

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又一探索

——评皮军著《中越经济体制改革比较研究》…………… 129

唯物史观与现代社会形态“趋同”发展论纲…………… 134

实现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

——以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实证分析…………… 167

恩格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意义

——追求最严格科学性的学术著作…………… 181

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价值论”

——与晏智杰同志商榷…………… 197

对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阐发

《反杜林论》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著作

——从三版序言说起…………… 213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杜林把经济学“自造的体系”归结为最后

的终极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 229

在产品社会运动中,生产是起决定生产的全部

性质和全部运动的作用;生产资料所有制是

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

——杜林“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要害,在于

把经济和政治的全部关系弄颠倒了…………… 251

价值论是经济学体系纯洁性的试金石,劳动价值论 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劳动进行生产,暴力进行分配”,表明杜 林全部经济学的智慧到此为止……………	269
经济学说发展史的光辉论述 ——揭穿杜林以“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而 自诩的无知……………	298
过渡时期和不经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 可能性……………	317
暴力革命与革命的和平发展 ——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323
未结束的结束语 ——现代社会主义“实现论”试探……………	334
附论一 从恩格斯为《新纪元》题词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 本质的表述……………	340
附论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问题的理论研究……………	349
附论三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 ——从改革实践引起的理论思考……………	363
附论四 商品经济“解体作用”的分析 ——兼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373
附论五 产品社会运动的轨道与动力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社会主义运用……………	387

附论六	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之比较优势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言 关于产品社会运动“中间环节” 理论的社会主义运用.....	398
附论七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 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 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二	412
附论八	从“国际价值”引起的理论思考	
	——以美、英、中、俄为实证分析	432

引 论

中国崛起 俄国觉醒

在第一本书中,我以“前车之鉴与走自己的路”开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越、朝、古等先后出现,同苏联以及东欧诸国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从而,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了,苏联和美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们亲眼看到也亲身体验到,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处在一片凯歌声中,另一方面,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然而,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息它们”(第一次的尝试是乘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初期,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死在摇篮中”)。更有甚者,美国还发动侵朝战争。众所周知,新中国刚诞生就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最终打败了侵略者。

可是,五十年后,乘苏联依照斯大林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启示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机会,叶利钦提出应当先政治体制改革,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竞选总统者必须退出任何政党的主张。这一来,叶利钦退出共产党,竞选胜利了,反过来,以总统卫戍部队的坦克炮攻打坚守在议会大楼中的共产党群众武装。接着,实行了两次所谓“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苏联瓦解崩溃了。不久,叶利钦退休了。

我认为有必要把我在第一本文集引论中的一段话插在这里,

以便说明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国家对集体农庄的领导职责完全交给地方机关,取消了由国家自上而下达计划指标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只规定农产品的采购总量,价格也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而使集体农庄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和主动性。更重要的是解散和改组国有国营的机器拖拉机站,将其所有设备卖给集体农庄,试行小组包工奖励制,使劳动报酬与终极成果直接联系起来。这一来,既壮大了集体农庄又更进一步调动了劳动积极性。当然,这种趋向同斯大林对如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的设想,背道而驰。正如赫鲁晓夫所说的:“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其次,在工业、建筑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改革。这方面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将各部门(条条)行政组织的管理改为地区(块块)行政组织的管理,从而使斯大林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受到一次很大的冲击。第三,特别必须注意的是,当时应运而生的利别尔曼学派对改革实践的理论观点。这个学派的主要主张:(1)“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规定的是,一切投入社会劳动的领域、一切生产部门和一切消费方向的发展上的总的比例、增长的速度和最优的对比关系。”也就是说,中央计划下达给企业生产单位的指令性指标,只需要品种的产量、交货期和赢利额三项指标就行了。其余指标由企业根据这三项指标自行制定。(2)上述三项由国家下达的指标中,以赢利额即利润率为核心,而且把赢利和奖金直接挂钩,以贯彻职工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相结合的物质鼓励原则。这一来,建立国民经济管理计划体制的同时,也就建立了整个企业经营活动的动力机制。(3)与此同时,由于企业在国家领导下实行经济核算,具有较大的生产经营独立自主权,从而,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论是生活消费品或是生产资料,必须按其价值进行商品交换,不能无偿调拨。而且,“逐步地把

物质技术供应转移到有计划的批发轨道”。至于资金供应,是按商品交换的办法收取利息,在利润分配上“采用企业按份额分享利润的原则”,放弃把闲置利润余额的固定数上缴预算的做法。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竞争。由此可见,按照这个学派的主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起来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不仅违反了斯大林的主张——“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必须将集体农庄生产的剩余品从商品流通系统中排除出去,把它们纳入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之间的产品交换系统”,而且,甚至会出现斯大林所警告的更糟的情况,即如同“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会使杜林的所谓‘经济公社’走向复活资本主义的地步”。

不论是赫鲁晓夫的实践措施还是利别尔曼学派的理论观点,都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遗嘱”和经济管理体制的苏联模式发生严重程度不同的抵触。对此,50年代和60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曾展开了热烈争论。这一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辩论,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引起了我国的强烈反应。从1963年初开始经历三年的反“苏修”情况,记忆犹新。结果是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上台,强调改革要谨慎、稳重。从此,改革实践拖延了18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临近停滞状态,整个社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不能再拖下去了,改革迫在眉睫。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上台立即提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号召大家必须解放思想、正视现实,进行经济改革。此时,应运而生的是以阿尔别吉扬院士为首的西伯利亚改革学派。这个学派通过自己办的刊物,直接宣传他们的改革思想和政策主张。他们着重指出过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把民主原则置于行政管理重

压之下，既不能调节好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发展，也不能调节好劳动者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指出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表现。这种理论观点否定了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会自动适应”、“不会发生矛盾”的观点。据此，他们主张必须“打碎这种体制，代之以一种采用经济杠杆和扩大民主（以抵消官僚主义）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在新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劳动者集体可以决定企业的发展政策，批准他们所在企业的发展计划”，有权选举自己企业的“各级领导人”。换言之，在新的经济管理体制中，企业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它按照完全经济核算的原则办事，自筹资金、实行自治”。当然，他们同时明确指出，这种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或经营机制，是“社会主义经营的形式和方法”，或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他们称之为生产关系的“亚系”，即生产关系的外部层次，也就是涉及了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据此，他们还进一步否定了当时苏联理论界流行的在商品货币关系上的“外壳论”和“暂时论”，以及把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对立起来的看法。他们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不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引进的，而是由苏联企业联合公司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而是任何一种建立在发达的分工和以商品进行联系的基础上的体制都具有的一般特征。所以，他们主张对苏联经济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革，中央计划只规定指导性的国民经济最基本的比例关系，作为企业具体计划的“出发点”，从而，以企业作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点，形成了西伯利亚学派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总设想的基础。

以西伯利亚学派理论观点为指导的、安德罗波夫主持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大规模试验，就是着重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内部活力。这场试验不到三年，再经过同样短暂的契尔年科时期，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上台，才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起

来。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联共产党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地总结了20多年来苏联改革实践所走过的道路,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再认识,制定了“全面完善社会主义”的新党纲,通过了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和2000年前的任务,进一步确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进行全面改革的方针。当然,这个时候西伯利亚学派的理论观点已经被吸收、形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个《新思维》是他重新思考了苏联7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得出的结论。1987年11月,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改革与新思维》出版了。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设成就是无容争辩的,同时,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非进行改革不可。他们认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向列宁求教,特别是“列宁关于必须考虑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关于计划工作和经济核算,关于善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论点”。改革实践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自治,鼓励主动性和自主性。这样才能既“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依靠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活动,打破一切障碍“使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又可以“从上到下,从经济基础、所有制关系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进行改善和更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革命”。他们强调这场革命就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就是“列宁的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日子里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直接继续”。

由此可见,我国由1963年初开始经历三年的反“苏修”运动,可能对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然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和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引下纠正超阶段发展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应当对苏联的改革起积极的作用。1988年2月苏联最高法院主

席团取消了1938年判处布哈林死罪这一判决,恢复他的名誉,应是一个有力的实证。如果当时苏共受到中共更大的影响,那该多好呀!不过,这个机遇被叶利钦掌握了!

普京当总统不继续搞私有化,埋头苦干。连选连任又当上总统的时候,他说话了。他说:苏联解体是个悲剧,原来所存在的问题,可以在前苏联体制的框架内解决的。他还认为,斯大林虽然是一个专制独裁者,但是,他当年的功绩是不能全盘否定的。我们只能听其言,也观其行,虽然很有限,如果说他有所“觉醒”,也不是没有说服力的。不过,我们还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当然,今天我说继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一方面,蕴涵着纳入第一本书诸论文的学术观点,是符合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蕴涵着纳入第二本书诸论文的学术观点,也是符合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精神,同时,希望也能符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我之所以大胆地这样说,是学习我的启蒙恩师王亚南教授的说法。王老师说他的《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出版)是用“化验室的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之所得,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出版)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大众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成果。前者的学术观点竟能符合后者的经验总结,理应归属于后者。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体现。关键在于作者的世界观、方法论以至阶级立场都已经改变了。

在这里,有必要告诉大家一个动人的事例为实证。王亚南教授年幼家贫,然胸怀天下,砺志于学。1929年大学毕业即投身北伐,而与郭大力先生不期而遇,因叙非常之志向,运筹鸿篇之巨作。此后时分时合,大量翻译研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论著,特别是1938年合译出版了《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通过边学习、边研究以达到有效的运用,1946年《中国经济原论》横空出世,独树一帜,学界为之震撼!

这里所要补充的一个实证就是全国解放前后,王亚南履行自

己的格言：“要有‘定见’，不能有‘成见’”。先是于1949年7月紧急出版了一本《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原论》的续篇，他说，这是为了使《原论》中通过“化验室方法”“研究所得的诸种法则，再回到现实中去经受检验。”随后又当机立断于1950年11月再出版了一本《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他说，这是因为“不到一年工夫局势发展太快了，那里面所针对着的研究对象，完全改变面目了，所以依据在新的环境下学习与体验，勾销了失去时效的部分，增加了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转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之内在必然联系的探索的基本任务。”从而，王亚南的研究转向使《中国经济原论》与《新民主主义论》接轨。《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中的五篇附论充分体现了这种情况。1951年开始他继续出版了《封建制度下的领主经济形态与地主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等书。

1957年《中国经济原论》正式改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为书名。王亚南也被誉为“第一个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作科学的系统说明者。”这是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争论的一个小结，不仅在当时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即使在今天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1998年，这部巨著恢复原名被推荐为“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有较大影响的10本经济学著作”。此举，从经济学理论上，具有填补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空白的意义；从实现现代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看，也具有时代性和直接实践的意义。

这第二本书中，首先在第一组中编入关于“弘扬王亚南的科学精神”七篇论文，既是纪念恩师，更为表示愿与志同道合者共勉之。

其次，在第二组的七篇论文中，一方面从唯物史观角度，阐述了我对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俄（苏）、中）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所初步取得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从劳动价值论角度，阐述了我的自我鉴定。

当然,这一切都是很肤浅的,我这样做,为的是公之于世,以求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不过,我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地重新学习恩格斯逝世后,列宁对第二国际各流派经济思想的论争时,怎样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从而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同时,他还联系俄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和社会主义可以再划分阶段以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通过合作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等。其中特别重视列宁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布哈林的“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学”等著作的评论。

当然,我也重视斯大林的论著以及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东欧、西欧以及日本的新发展,其中,我关注着美国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派”的动态。

所有这些重新学习如有一得之见,都会以论文“增补”的形式,穿插在第二组有关的论文后面。

再次,第三组的七篇论文,是我在《〈反杜林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与苏振富教授合写)中写的一部分专题,另一部分专题的七篇论文已纳入我的第一本书。

总而言之,以两本书的全部论文为基础,我还另写一篇短文(未定稿)——“现代社会主义‘实现论’研究”,作为本书的未结束的结束语,以表明我的最新观点——中国不仅坚定地继续走自己的道路,而且持续地同美、俄诸国一起在联合国主导下,和平发展“新全球化”;“苦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和“苦于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通过各自的过渡阶段,相互促进携手趋向现代社会主义。这样的编辑可以显示出我的学术观点的理论总体及其内在联系。